



東方論壇

本刊的新生

經過了一二八慘痛的事變，經過了日本帝國主義重砲與轟炸機的摧毀，經過了敵軍疏瑣彈連天不絕的焚燒，東方雜誌從那殘破淒惻的灰燼瓦礫堆中，竭力地掙扎着，現在居然又得和親愛的讀者們相見了。

一二八事變中，日本帝國主義所加於商務印書館的物質的精神的損害，在本期裏王雲五何炳松兩先生已有所論述。讀者們揭開了本期的封面，就會看到那些慘酷的紀念照片，表現了帝國主義的橫暴獸行和鉅大的破壞力。這些照片也許將在讀者們的腦中，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慘痛印象罷！一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向東北與上海武力進攻，整

個的中國民族，遭遇了歷史上希有的大犧牲，在這鉅大的民族犧牲中，商務印書館所受的一部分損害，實等於滄海一粟。要是拿歷年來帝國主義在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上所加於民族全體的危害，總算一下，那麼本刊這次因國難而遭受的損失，又算得什麼！常言道：『多難興邦。』國難不一定就算是災害。只要經過了患難能加倍振作，經過了破壞能努力重建，經過了屈辱能發憤報復，經過了高壓能奮力抵抗，民族酌途決不會沒有希望的。從兵燹後的灰燼瓦礫中，竭力掙扎，重新振作，創造本刊的新生，創造民族的新生，這是本誌復刊的一點小小的——也許是過分誇大的——願望。

我們十二分地明白，欲求民族的新生，單靠了筆頭和紙頭，是不中用的。慕沙里尼說：『砲聲更響於言辭。』我們是生在「槍桿兒」的時代，不是「筆桿兒」的時代。近數十年來政治的經驗告訴我們，外交公

文敵不過飛機大砲，理論宣傳敵不過實力鬪爭。難道我們以前上當還不夠，現在還能再相信可以單靠了文字來「救國」嗎？

不但我們不相信可以單靠了文字救國，連文字這東西根本有什麼用，我們都開始懷疑着了。近年來，內憂外患的狂波怒濤，把我們這一輩，這些握筆桿兒的怯弱的書生們，都震撼得站不住腳了。大家已開始覺得文字是浪費而沒有用的。假如我們不能手開筆桿兒，去拿槍桿兒，那麼我們只有沉淪和沒落的份兒，這大概是目前智識分子同有的感想罷。

但是單靠文字救國，固然不對，如絕對否認文字的力量，也只是一半真理。我們已脫離了原始的簡單的生活時代。現代的民族鬪爭和社會鬪爭，都用着非常複雜的方式，沒有文字和理論來作指導，斷沒有決勝的把握。這好比近代的戰爭，固然必須有英勇的士兵隊伍，但同時也省不了機智的參謀本部。參謀離開了士兵，固然不能作戰，而沒有參謀的軍隊，也便等於烏合之衆。假如以前文字的工作，不能發生効力，這是因為文字和現實離得太遠了。中國的智識分子，沿襲了士大夫的習慣，喜歡站在雲端中，說些不關痛癢的話。這些離開現實的文字，誠然是浪費而無用的。但是分析現實，指導現實的文字，卻在民族社會鬪爭中，有他的重要的使命。所以我們不必咒筆桿兒，頌讚槍桿兒，現在所必要的是，筆桿不離開槍桿，槍桿不離開筆桿。

拿筆桿的智識者，如果能夠用着拿槍桿的精神，捨身到現實中間

去，時刻不離現實，我想除了懦怯以外，決沒有自悲「沒落」的理由。以文字作分析現實指導現實的工具，以文字作民族鬪爭社會鬪爭的利器，我們將以此求本刊的新生，更以此求中國智識者的新生。我們不敢相信一定可以達到我們的標的，但是能做到幾分，我們就做幾分。（愉之）

樂觀論與悲觀論

對於應付國難的方法，有兩派不同的意見，一派是樂觀論者，一派是悲觀論者。這是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上面提出的名辭。樂觀論者相信一切國際公約和條約，都有法律的道德的制裁力，國際聯盟和美國至少總得說幾句公道話。日本雖然有強大的武力，但在道德與論方面，已陷於孤立地位，所以中國不必灰心失望。反之，悲觀論者，則以為一切和平公約，本來就只是帝國主義玩的把戲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，能夠主持公道正義，所以中國不能依賴國聯或英國撐腰，除了自己奮力抵抗以外，只有亡國這一條路。

九一八以後，我們的政府，就是第一個樂觀論者。國民政府和出席日內瓦的中國代表幾次對內對外聲明，中國完全信賴國際聯盟，並且相信國際聯盟可以有一個辦法。張學良不抵抗日本軍隊，並不是甘心放棄東北，只因為武力抵抗無用，倒不如憑藉國際勢力使日本退兵，所